

# How to Detour in Order to Enter? —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François Jullien's Research Strategy

Zhudong T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30, China

## Abstract

François Jullien, due to the unique nature of his scholarship, has sparked controversy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garding his research: Many French sinologists do not recognize him as a sinologist, while many French philosophers do not consider him a philosopher but rather classify him as a sinologist. His research has its uniqueness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Sinology research: using Sinology as a method rather than an object, thus conducting descriptive non empirical research through a “roundabout” approach. This research method has also sparked praise and criticism worldwide. The paper integrates the viewpoints of the opposition represented by Swiss sinologist Jean François Billeter and the supporters representing the majority to analy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research method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Keywords

François Jullien; Jean François Billeter; detour; otherness; sinology

# 如何迂回以进入？——对弗朗索瓦·于连研究策略的评价分析

田铸东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四川成都 611730

## 摘要

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由于其治学的特殊性，学界对于他的研究存在争议：许多法国汉学家并不承认他是一位汉学家，而许多法国的哲学家也并不认为他是哲学家，认为他是汉学家。他的研究相对于传统汉学研究具有其独特性：以汉学为方法而非对象，从而以“迂回而进入”的方法进行描述性的非实证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推崇与批评。论文整合以瑞士汉学家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为代表的反对派以及代表多数派的支持者的观点来分析这种研究方法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意义。

## 关键词

弗朗索瓦·于连；毕来德；迂回；他者；汉学

## 1 毕来德：对立性的陷阱

毕来德，1939年出生于瑞士贝尔，瑞士著名汉学家，同时也是日内瓦大学的教授，妻子是中国人，且在北京居住了很长时间。毕来德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思想的著作，他对中国思想家庄子和道家文化特别感兴趣，其著作《中国写作艺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毕来德于2006年出版《驳于连》，并在其中反对中国是另一个西方的说法，指出了于连对中国解释的局限性。毕来德认为，于连作为世界范围内多产的著名思想家，他有责任阐明中国思想的内在性。毕来德的异议也得到了很多支持，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冬君为此目的在《中国图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真理之辨——读毕来

德〈驳于连〉》的文章，该文章指出，于连与毕来德，约等于东方与西方，他们各自站在当今法语汉学的两极。但从其各自所由出发的西方思想源头来看，于连应算作欧洲浪漫主义时代的人，而浪漫主义萌生出了文化多元主义；毕来德以理性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具有局部且单一的地方性视作无知，认为欧洲的历史思想才具有统一性。如此，中国历史（地方史）就被擅自理解成了西方史（世界史）的一个不成熟的阶段<sup>[1]</sup>。于连和毕来德的争论，是欧洲浪漫主义与启蒙主义的争论还魂于或延烧至“法语汉学”领域的标志。

对中国的错误解释，是毕来德对于连的批判。在《驳于连》一书中他指出：“首先要注意的是，他（于连）的全部著作是建立在中国的相异性这一神话之上的。他的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观念，即中国是一个与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的，甚至与之相对立的世界。因此，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

【作者简介】田铸东（1996-），男，土家族，中国贵州思南人，硕士，从事英语翻译学研究。

要确定这种神话来自何处。”<sup>[2]</sup>也就是说,根据毕来德的观点,于连的所有著作都基于这样一个思想,即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甚至彼此相对。为了确定这种幻想的起源,毕来德回想起了不同时代的法国学者,他们在向中国介绍“不同之处”方面发挥了作用。举例来说,法国小说家兼汉学家维克托·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著作中融入了异国风情的哲学,更确切地说,他将异国风情转化为一种哲学理念,并承认这种异国风情其实是纯粹存在于想象之中的<sup>[3]</sup>。抵达北京后,谢阁兰在一封信中写道:“事实上,我来到这里寻找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而是中国的幻象。”在德国,由传教士转为汉学家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翻译的《易经》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他让许多欧洲读者坚信在他们所处世界的另一个角落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世界。卫礼贤还曾说,中国是“人类经验的另一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文化传统,其社会结构、价值观、哲学思想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差异。这样的文化背景塑造了与西方不同的人类经验,也正是如此,中国才能作为一个纯粹的他者被进行研究。

于连的研究方法从概念来看是东西方是完全相对的,无论在历史还是主流思想上,只有处于概念上的相对才能构成“迂回以进入”的研究。18世纪以来的欧洲学派抱着这样的想法,20世纪以来的新中国比较派学者的研究也殊途同归。于连在强调对他者的责任时,有时可能忽视了自我的权利和需求。如何平衡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问题,可能导致自我在伦理关系中被过度牺牲。将他者视为一个整体,缺乏对不同个体之间差异的细致分析。现实中,他者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而是由各种不同背景、文化、性别、阶级等构成的复杂个体。忽视这种多样性可能导致理论的局限性。同时,即使不同的他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但其统一性也自然存在,于连的选择的随意性也导致两个个体之间的重叠交错被忽略,这样的相似性不知凡几,却往往被比较派们视若无睹,只字不提。

但是,比较学派的思考方式最严重的后果还在下面。他们一心要建立两个互为对称的历史,因此忽视了每一方间断、矛盾或不足的地方。于连谈论中国的思想家也一样:因为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的历史轨迹仿佛从来都是一致的,而且思想也不包含任何疑难和幻想,这等于放弃了对他们的批判,也放弃了对他们的深入理解。这样的行为等于否定了哲学的理念本身,因为哲学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一种个人的伦理的和智力的探索。

于连以其对中国哲学和西方思想的深刻理解,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跨文化对话。这种视角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新颖的思想交流方式,还让读者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重新审视和理解自身文化。通过对中西哲学的比较,探讨了许多基本的哲学问题,如存在、时间、空间、他者等。这些深刻的思辨为文学作品注入了思想深度。而于连的文字往往晦涩难懂,对于历史经典的引用也是随意而为,因此在欧洲读者看来,

于连向他们提供了一个想象中的中国,单纯的幻觉充满新奇,却又不必过度深入了解,这样的理解方式在思维层面不再是对哲学的探索,而成为一种理解的通道,其结果令人遗憾。于连让自己的读者自囿于一种自命不凡的无知中,妨碍了他们与中国本身发生对话,甚至于连本人也不进行这种对话,以历史的中国作为旗帜,沉浸在他者的幻想中,对当下中国所发生的新事物新改变不闻不问,加强了彼此的封闭。

## 2 于连: 汉学作为方法

从毕来德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连的研究提出了强烈批评,指出了于连研究中的错误与局限。他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性质,打破了于连所建构的中国神话。这一分析使人们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现代意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也暴露了西方哲学传统在与中国古代思想对比下的偏颇。此外,这还使得在中西方文化融合中建立新思想传统的尝试显得不切实际。

面对毕来德的反对,于连亲自回应并出版了《一路走来,了解中国,复兴哲学》(*Chemin faisant: Connaître la Chine, relancer la philosophie*)一书,其中指出:“其他性,必须耐心地通过在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这两个文明之间建立对话而建立起来,这两个文明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于连从事的就是这项工作,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测试中进行,而无需假定其他性或原则认同。既为中国知识提供概念,又通过对中国的研究中来复兴哲学。在回复之际,于连简要介绍了所涵盖的距离或作为“他者”的方法以及所获得的成功。同时,也阐释了如何从相互的文化注视开始,为人类的自我反思开辟道路,从而摆脱人本主义及其软弱的思想。同时,于连也回应道毕来德并未花时间去阅读他的全部作品,因为毕来德指出不能根据他所依附的意识形态轴来评价:一方面是人类思想的统一;另一方面是中国思想的基础他者性。毕来德否认于连的工作是他的另一种方式,而又基本赞同于连的他者论题,这与他的目的不相一致。此外,大多数研究人员,记者和评论员仍然支持于连的立场,他的启发式策略以及从不同方面了解中国的思想都开导了他们,并且围绕着他的思想在法国和不同国家都举行了各种座谈会、发表了相关作品。

对于连的正面评价还来自与其研究息息相关的中国学术界,许多研究者高度评价于连的策略,并称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中也更多地采用了于连的研究方法。温州大学的刘毅青及杭州师范大学的王晓华教授在发表的《为何迂回与如何介入?——简评于连的汉学研究》中指出,于连的中西思想和诗学比较立足于文化间的思维差异,将中国置于现代性的问题域中,一方面为西方开拓形而上学的思考空间,欲使其摆脱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范式,进而走出形而上学所导向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困境<sup>[4]</sup>。华中师范大学的孙景强教授也在其文章《从笛卡尔的方法到于连的策略》表示于连通过在

“汉学—哲学”之间的转换进入漫长的迂回策略之中：于连的策略贯穿在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在此过程中，并未设定任何终极的目标或目的，因为后者都是作为过程展开的结果而存在的，策略依据的是“势和时”，因此，不会幻想一劳永逸地去“解决”哲学的全部问题。策略考虑到哲学问题面前的危险和障碍，然而这些危险和障碍恰恰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动力：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化解问题<sup>[5]</sup>。反映了他对于连这一研究方法的肯定。还有其他人批判毕来德对于连作品的过分诠释，并在其文章中以真实中国人的视角提出真实的中国历史和习俗，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在《为于连一辩——兼谈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立场与方法问题》中对毕来德的做法持反对态度，指出了他夸大了中国在欧洲哲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认为毕来德和于连是在完全不同的领域所进行的分析<sup>[6]</sup>。

### 3 结语

毕来德在《驳于连》一文中几乎全盘否定了于连的研究方法，在以前这是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而从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合理地对他的评论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要以一种公正的态度进行思考。把中国智慧作为他者，从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值得夸奖的研究方法，除了其本身的方法论意义外，还为跨文化意义开辟了广阔的视野，他对中国思想的迂回研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优势和存在的偏见，清楚地阐释了两种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如何转换和吸收的。

不同文化之间经常会出现文化波，习俗、口味、感觉、价值观与信念之间的异同也会使我们与外国人的交流中产生问题，而迂回这一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在与人交流时，尊重承认以及理解对方的想法，“相异性”一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经常用到，但是也经常被误解，其不是让我们

去改变异议，而是当异议出现时，我们必须表现出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增进互相了解，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宽容。其次，于连的研究放弃了以种族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方法。他在审视中国思想时，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和社会以反映西方社会，以这样的方法开启了两个文明之间平等的对话，真正的对话。在当今世界，国际局势并不和平，面对国际关系不受控制的发展，当权者必须应对主权危机和国家意愿，西方政治家一直是国际政治的领导者，他们不在乎其他国家的未来，中国作为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国家，提倡在差异中寻求共同点，而于连对他人的正义愿景与中国社会所传播的理念不谋而合。最后，回归到于连的策略，也可以让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一方法可以帮我们通过他者来选择和改善自己的文化劣势，与此同时，我们也还需保持警惕，于连虽然热衷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但其目的地始终在西方，怎样在狭隘的自我中心和他人同化下保留自己的主观性是我们交流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认识自己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他人，因为每个人都是所有人类的缩影，了解对方则是彼此了解的一面镜子。

### 参考文献

- [1] 李冬君.真理之辨——读毕来德《驳于连》[J].中国图书评论, 2008(5):38-45.
- [2] 毕来德,郭宏安.驳于连[J].中国图书评论,2008(1):8-27.
- [3] 维克托·谢阁兰.碑[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 [4] 刘毅青,王晓华.为何迂回与如何介入?——简评于连的汉学研究[J].哲学研究,2010(6):73-78.
- [5] 孙景强.从笛卡尔的方法到于连的策略[J].法国研究,2009(2):57-67.
- [6] 李春青.为于连一辩——兼谈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立场与方法问题[J].中国图书评论,2008(6):36-44.